

# DISEASE and

# LITERATURE

## —穿梭在情節中的病魔

旗均譯

### 一、歷史是心靈所見到的過去

編寫歷史是一項藝術。史學家屬於社會，分享社會的激昂和挫敗，希望和憂愁。在火熱的驅策下，他開始查考過去；不是一整個過去，而是某一段時間，某一件事或某一群人。爲了明瞭事情的始末，他收集一切資料，盡力去了解和解釋，漸漸地，過去的人物時事重活過來，甚至如此鮮活以致他渴望與人分享，藉生動的文字表達出來。因此史學家重現了歷史，並藉此讓「書史」成爲不朽的藝術。

左拉（註一）曾定義藝術爲「心靈所見到的自然」我們也可同樣認爲歷史便是「心靈所見到的過去」藝術家與人分享所見所思，史學家則傳達足以鼓舞人心，激發行動的己身經驗。經由他們的工作，不爲人知的發展和趨勢有了新的意義。人們逐漸覺察，而覺察帶領了人們的行動。因此歷史絕非過去死死的畫面，反能帶動生命，成爲最大的動力。

歷史既有如此巨大的作用，書史者便須負起相當的責任。他必須臣服在歷史研究的規則下，在嚴格的限制裡闡釋過去，非有確切的資料，不能認定某人說了什麼或做了什麼。如要描述一個病例，他亦必以存在的經驗爲依據，

不得稍加增減。因此他們所呈現的歷史必須完全真實。唯有真實的歷史才能帶來正確的結果。虛假的，輕率的，未詳加求證的和刻意宣傳的歷史必然造成傷害；過去如此，環顧今日，我們仍可以輕易見到以不實歷史爲依據之政治哲學爲人類帶來的禍害。

和史學家一樣，詩人、作家、戲劇工作者也都能重現這個世界的某些層面，所呈現的亦必真實方可創造最大的影響和說服力。可是他們所享有的自由卻遠超過史學家。他們可以創造一個人，史學家卻只能再現一個人。

### 二、疾病常決定某些人的一生活格

作家自經驗中汲取靈感，記錄成文。他生過病，見過一場大病如何改變別人的一生，也曾親嘗病痛所帶來的創傷。許多偉大的作家都會罹患結核病，如雪萊（Shelley），濟慈（Keats），惠特曼（Walt Whitman），莫里哀（Moliere），梅呂美（Merimee），契訶夫（Chekhov），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i）。就某些人而言，如席勒（Schiller），疾病是必須加以克服的障礙；對其他的人，疾病卻成爲決定其一生性格的中心經驗。



流行病學家福德卡斯特拉出版了一冊醫學詩，名為「梅毒」

arrhoeas)，失血(Bleedings)之類較為深入的術語。他們感興趣的不是疾病，而是疾病所帶來的影響。

在托爾斯泰(Tolstoy)不朽名作「安娜，卡列妮娜」(Anna Karenina)中，女主角安娜臨盆後忽患產褥熱(puerperal)，引入全書的高潮和轉捩點。托氏以淺易但正確的詞句描寫此病，因為症狀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安娜將因之死去。安娜悖逆倫常，縱慾非法的私情中。情人事業失敗，丈夫要求離婚，放逐必成最後之歸宿。然後她生產罹病，甚至將死；二個男人碰面、握手；丈夫原諒了她，情人返家舉槍自擊，故事至此似可完結，可是事實不然卻使本書成爲不朽的著作。安娜出人意外地康復起來，開槍自戕的情人也沒有死成，二人遠走他鄉，在一段短暫的幸福後，共同生活變得不可忍受，安娜自殺，了結此生。

托爾斯泰在這部小說裡成功地運用疾病來加重氣氛。安娜自殺後，情人絕望從軍，就在馬車的當兒，一陣莫名的牙痛襲了上來。或許這並沒有什麼意義，可是藉著它，伏洛夫斯基(即情人)當時所處絕望的情境竟變得無以復加的深重起來。

在其他的小說裡，疾病也會被類似的運用以鋪敘情節或刻劃情境。由於作者不是醫生，作品也不是爲專業人員而寫，因此引用的絕非罕見的怪病，而是衆所周知的一般病例。其中取捨則決定於時代背景和預期的效果。

13世紀時Hartmann Von Aue在Armer Heinrich中塑造了一個痲瘋病人以刻劃女子對其奉獻不渝的至愛，這在當時是合乎情理的，可是如果放到痲瘋絕跡的20世紀西方社會，那就會顯得格格不入。1895年Hans Pfitzner的歌劇，1902年Gerhard Hauptmann的舞台劇都會重演那個角色，但只是假中古人物以彰人性的純浪漫(Romanticism)手法罷了(註三)。現代小說則不同。在Henry Bellmann的King's Row中，男主角喪失雙足，痛苦地爬行取代痲瘋成爲女子自棄式純情的指標。

享譽文壇的醫生作家不計其數，包括哈勒(Haller)，契訶夫(Chekhov)，(Schnitzler)，(Duchamel)，(Weir Mitchell)，(John Rath bone Oliver)，和(A.J. Cronin)。對他們來說，什麼會比疾病、痛苦和死亡更真實，更自然，更能作爲寫作的題材呢？

因此，自古至今，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和疾病有關的作品，在此無法一一列舉。此外這類作品相當廣泛，大多數又會爲資深的醫生閱讀過。他們摘錄相關情節，著專文探討，或研究作者所患疾病對其作品的影響。在此筆者僅略述一二。

### 三、“安娜，卡列妮娜”和產褥熱

一般而言，疾病並非良好的文學素材。高中時每逢作文課，老師總是告誡我們不要盡寫自己的麻疹、百日咳或猩紅熱。他說生病固然是個人的大事，可是不厭其煩地描寫它們往往無法引起興趣甚至令人生厭。況且成千上百的人都曾有過類似的經驗，這樣的題材便愈發缺乏創意了。

老師的建議不錯，事實上除了在以後會談到的Naturalistic school裡(註二)，一般作家只用淺易的詞句描寫疾病，談不上嘔吐(Vomittings)，下痢(Dr-



#### 四、文藝復興時期，鼠疫為時尚的題材

Boccaccio 在 Decameron 的引言中生動地描寫鼠疫，為全書作精彩的辯白。1544 年，伊莉莎白時代醫生作家 William Bullein 所寫的 A Dialogue against the pestinense，不僅是一本教材，更深入刻劃出不同的人瀕臨死亡的各樣反應。以後鼠疫雖然絕跡，以此為題的作品仍然籠罩著世界；例如 Daniel Defoe 的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 of 1722，雖然只是一本普通的書，長久以來卻被公認為珍貴的歷史文件。

Dogoe 五歲時，鼠疫最後一次襲擊英國，因此該書可能純屬想像，只是兒時記憶或正誘發其靈感也未可知。浪漫派作家順理成章地採用此類強烈的題材，因此鼠疫甚至在 William Harrison Ainsworth 可怕的小說 Old St. Paul 中出現。如果現在的作家要以鼠疫為題材，那他們必須將背景移到中國（註：清末民初之際），如 A. J. Cronin 在 the key's of the kingdom 中所為——集一切災難之大成於“封面和封底之間”。

痛風（gout）是 17 世紀流行的疾病。此病傳播極廣，尤盛行於上層階級。1681 年，曾作專文加以探討的 Thomas Sydenham 自己便得過痛風，因此對之瞭若指掌。當時痛風常用來調侃醉酒女人，逸樂無度的古斯塔夫式貴族的行為，並以極端痛苦卻不致人於死的諷刺性格見用於藝術家 and 批評家。病發時，痛苦難堪，痛止後，依然故我，劇烈的症狀和輕微的傷害造成強烈的對比，

托出奇異的喜劇效果。牙痛也能如此，因此成為 17 世紀荷蘭諷刺家盛行的題材。狹心症就不同了。其痛苦的程度和致命的危險適成正比，帶來的便絕非喜劇而是悲劇了。

發熱性疾病是 18 世紀的通病。瘧疾不僅肆虐南歐和南美，更朝北傳播，為害深遠。傷寒則是每一個國家共通的地方性疾病。在許多作品中，發熱是常見的症狀，因為

劇情要求多久，它就能癱瘓一個人多久，甚至癱瘓到任何一個程度，只要我們願意。發熱是具有此類特性的疾病中最常見的一種，只是書中的描述往往籠統散漫，含糊不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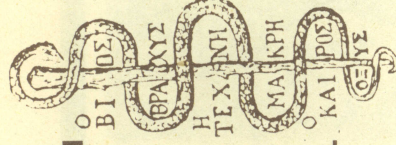
浪漫時期的作家放棄窮研中世紀，改以當世題材為主。他們喜愛肺結核，萎黃病（chlorosis）之類消耗性的疾病。後者是年輕女子的通病，迄今早已絕跡，因此有人以為當時女子穿著緊跟裡衣的習慣與此必有大的關係。只是無疑尚有其他因素。此病盛行於上層華富女子。她們長處深閨，足不出戶，少運動，日日與女紅，音樂為伴。白虛，輕盈的體態和神韻攫去了詩人的心。

結核病在當時也頗為流行，甚多作家身受其害。此病以發展遲緩見稱，患者仍可熱心公務，汲汲世事，甚至縱情肉慾，放跡形骸。可悲的是即能如此，最後仍難逃一死。在塊肉餘生記中，David Copperfield 年輕的妻子，在短短的三個星期內，由感染而身亡，這是一個例外。在大部分的作品裡，它都是慢性遲緩，欲蓋彌彰的致死痼疾。

#### 五、自然主義興起為文藝界帶來新氣象

十九世紀下半期，自然主義（註四）興起，為文藝界帶來新的氣象。長久以來，疾病便在小說中有其一席之地。每一種疾病因其特質和當世背景發生耐人尋味的關聯。中世紀是極權專制的時代，盛行的亦多麻瘋，瘟疫和舞蹈狂（Dancing Mania）之類侵害一整個國家社會的集體性疾病。

以後文藝復興降臨，人文主義抬頭，和旁人無關，純由個人行為所致的梅毒毒起，在許多作品中出現。巴洛克是個衝突的時代。在法國和西班牙，專制政府仍然存在，而英荷諸國之民主政治早已風起雲湧，開花結果了。而在笛卡爾的理性主義震天價喊，高唱入雲之時，反改革的宗教狂潮也洶湧澎湃，不可遏抑。巴洛克也是個矛盾的時代



，飢餓性斑疹傷寒和麥角中毒與過度宴樂帶來的痛風和水腫共同存在，蔚為奇觀。

某一疾病之所以被引用固然與其時代背景有關，作者所要達成的目的也是重要的因素。如果某個角色必須迅速死去，那他常會死於晴天霹靂的肺炎或心臟病。如果只代表一個危機，那他常會在緊急的病症（如腦膜炎）後逐漸康復。此外，不明究裡的發熱和頭疼也能讓人病奄奄的。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前，疾病的描述往往止於不可或缺的一般症狀，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自然主義興起才逐漸改變。

十九世紀是科學萌芽的時代，科學的威力衝擊著每一個角落。1865年法國生理學家Claude Bernard 寫了一本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強烈而明晰的將醫學定則陳述出來，受到包括一般人在內廣大讀者的歡迎。這是以理性為基礎的純科學產物。「總而言之」Claude 教授說道：「在實驗方法和其他一切事務中，理性允為唯一而真實的資料」「人的心靈始終以相同的方式和相同的生理程序思考。」「推測一定的法則，法則是一切的主宰。因此以為事出無因或與他事毫不相干便是純粹的反科學了。」

當 Claude 教授在法蘭西學院作實驗示範時，不僅生理學家慕名前來，他如化學家 Marcelin Berthelot，哲學家 Paul Janet，及史學家 Ernest Renan 亦恭逢其盛，撥冗一聽。

在這同時，亦即 1861 ~ 1864 之間，法國醫生 Armand Trousseau 將新興的科學應用在臨床醫學上，寫了一本 *the lesson of medical clinic*。這本書其實是「不折不扣的病例報告，內容非常詳盡，卻意外地吸引了許多醫學的門外漢。這或許是因為詳細完備的病例報告不異患者的自傳，讀起來自然分外親切。從此 Trousseau 及後期幾位神經學家的診所便人滿為患，擠滿了醫學生、醫生、作家、哲學家、史學家、科學家及各式各樣的人。

在所有的科學中，醫學或許最為人注意，其中又以生理學為最。很少人有機會接觸高等數學或天文學，可是每

個人遲早總會和醫學發生關係。醫生便是人人遇得見的科學家，醫學的地位在十九世紀如日中天。此外醫學亦具體的表現了新興科學深入人生的實用性，與之相比，物理學或化學便要遜乎其後了。在醫學中，生理學是最富哲學意味的一支，因為生理學研究人體的機能，而每一個生理機能能在窮根溯源之後總免不了和哲學發生關係。

科學的衝擊很快便表露出來。Renan 教授首先稱歷史為「如化學的科學」，而 *Naturalistic school* 的創始人 Taine 則認為「善與惡」也不過和「硫酸塩，鹽類」一樣，同為人體的產物。此外 Taine 又參考 Claude Bernard 教授，提出「環境影響人性」的理論。Comte 教授吸收了此一理論，加以擴充，提出「任何個體的生不存不盡依賴其所懸浮的內在體液，更決定於一切外在環境的總和。」以後 Bernard 教授又引入「內在環境」的觀念，以為「整個個體固然有其外在環境，每一個細胞在身體內也同樣擁有的內在環境，再者俱為個體生存不可或缺的要素。」除此以外，文學所受到的影響最大。法國文學家雨果早在 1859 年 *The legend of the century* 中便宣稱詩人和哲學家處理人生的問題，必須和博物學家處理動植物一般，而福樓拜爾 (Flaubert) 也認為小說必須是「科學的」，才有流傳的價值。

早期小說多少類似病例報告。1861 年在 Soeur Philomene 中 Goncourt 兄弟描寫醫院和診所的生活，1865 年在 Germinie Lacerteux 中則寫一下層女子的生活。後者在起頭便言明絕非虛構，結局也不圓滿，為要叫人學習 *the Clinic of Love*。同樣地左拉早期小說 *Th'ere se Raguin* 也可視為描述原我動物本能的病史。1886 年，左拉以 *Le Roman Experimental* (實驗小說) 為名寫了一篇論文，這個名字類似前述 Bernard 教授所著 *the study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左拉刻意如此為要陳明小說亦必須發揮科學實驗的精神，刻劃人類身處環境的自然面目，分析情感的機制，由此建立應用社會學的先聲。



「請吐出舌頭，讓我看看。」鄉村醫師的路邊診斷。

「醫學之美，不因為它在宮廷內，而因它常在貧窮人家的窄小居處中。醫師獲得的讚美，是因為沒有任何人能夠如此熱心有如此勇氣，完成如此光輝的任務。」

— Vicq-D'Azvr.

餘力地將科學方法運用在人文研究上。這一系列的最後一冊是 pascal 醫生的故事，他總結所有情節，對 Roufon - Marguart 家族的遺傳作廣泛而深入的探討。

我喜愛左拉，因為他是一個勇敢的鬥士。他沒有福樓拜爾那種與生活疏離的意識，反而熱切的迎向它，而對它。在一切左拉所描繪的淫亂和獸性中，我們永遠可以聽到向上的，在創造，勞動，真理和正義上重建新社會的渴望的吶喊。

Naturalistic school 並不排斥某些疾病。梅毒曾在反共復興和巴洛克時代風行一時，以後為純文學所唾棄，而今又再度出現於易卜生的戲劇幽靈 Ghost 和 Eugene Brieux 的貪婪 (the Avarice) 中，前者描述一個天生的病例，後者則探討梅毒對婚姻的影響。

在當時的作品裡，醫生，尤其是醫學研究者，常居首要的地位，這反映出當世注重醫學的事實。1899 年 de Curel 的小說 La Nouvelle 描寫一個禁不起誘惑的醫生，把病人當成試驗品，研究新型病毒，以後事態嚴重，不可收拾，只得用相同的病毒自殺身亡。全書刻劃入微，允為不可多得的作品。

精神病學是十九、二十世紀一門進展神速的醫學，不僅衝擊了當代文學，自身也因之為文學所激勵。事實上，二者是在交互影響之下，各受其益的。杜基妥也夫斯基並不是醫生，卻能熟練地描寫精神病患，癲癇和罪犯，這或許是因為杜氏本身便有精神病狀和癲癇，長久的經歷或造就了他別人所無的敏銳和襟懷。丹麥作家史特林堡也是如此，他的作品在許多方面都可視為精神病學的鉅獻。

文學與精神病學的關聯是顯而易見的。作家觀察生活——一人，人的思想，情感，情緒，矛盾，行為。沒有二個人完全相同。某些人非比尋常，因此特別吸引作家的注意。在心智健全和精神錯亂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絕大多數具有精神病傾向的人並未住院，這正提供作家作為方便的觀察機會。他把這些人擺到作品裡；在了解和解釋的過程中，自然也受到當時心理學和精神病學觀點的影響。

此一學派的繼承者從不畏懼揭發生活的醜陋面，相反，由於這在過去是如此地為人忽視，以致他們似乎全力以赴，樂此不疲。許多人窮研書籍，造訪醫生，對醫學產生莫大的興趣。在他們的作品裡，疾病是經常的課題，並且用最寫實的手法來描寫，絕不輕易帶過。當包法利夫人服神毒後，福樓拜爾並未略去任何細節，她的脈博加快，發汗，抽搐，嘔吐，每一個症狀都用純醫學術語詳加描述。(書中)當藥劑師回答醫生的詢問時，他說：「起先會有喉嚨乾燥的感覺，緊接著便是上腹部無以名狀的痛苦，劇瀉和昏迷。」

在左拉的小說裡，每一種病都赤裸裸地呈現出來。Londes 中充滿了令人作嘔的情節，可是誰說人生不正是如此。在 Fecondite 裡，左拉固然標榜了母性的光輝和大家庭的和樂，卻也毫不留情的突出了墮胎的醜陋和罪惡。L'Assommoir 可以說是一部描寫酒精中毒的小說，主角 Couper 死於因之而起的錯亂和瘋狂中，這段描寫感人至深，與真實的病例無異。以後左拉又寫了二十部有關 Roufon - Marguart 家族的故事，他稱之為「第二帝國下一個家族的興衰」和其他的小說一樣，左拉在此亦不遺

伊底帕斯與獅身人面獸鬥會。伊底帕斯被結  
乃佛洛伊德性學理論之重心。



和作家一樣，精神病醫生也研究“人”，只不過目的不同。醫生的目的在治療病人或至少減輕其病況。他所擁有的病例資料遠較一般醫生詳細，有時甚至類似小說。此外，精神病醫生也常在文學作品中找到類似，可以參考的故事，譬如Oedipus的戀母情節便是很好的例子。

十九世紀神經官能症的發現與CHARCOT在巴黎，Bernheim在南錫的歇斯底里研究工作為人類開拓出一片嶄新的天地。這些都是將科學應用在心智研究上的新嘗試。CHARCOT的診所每週公開一次，吸引許多知識份子，直間接影響到小說的發展。Paul Bourfret是19世紀末20年文學心理路線的代言人。他以一種精純的文體創作，內容多涉及當時巴黎人所稱“高尚生活”的保守天主教上層階級。雖然如此，他在1889年the Discipline中所描繪的卑下和殘酷，卻一點也不遜色於左拉一年輕的心理醫生設計引誘冷感女子，作為驗證其師所傳理論的工具。

歇斯底里的處理揭開了心理分析的序幕。當時許多醫生都採用催眠暗示的方法，可是二位在1889年曾和CHARCOT教授共事的維也納醫生，Breuer和佛洛伊德卻以絕大的勇氣，努力於新的嘗試。他們讓催眠中的病人自由說話因而發現在日麗封的記憶，而這或正是病態的癥結。這個方法也可以發洩一部分情緒，減低心理的壓力，他們因此稱之為“淨化作用”。1895年，二人合寫了一本，闡釋潛意識的發現和其在精神病源上的重要性。

以後佛洛伊德又發現另一個更容易深入潛意識的方法——分析病人自由聯想時所說的話以及夢的解析——並將之發展成另一套新的體系。為此，佛洛伊德曾大受抨擊，卻也得到不少狂熱的支持者。因此不管接納與否或評價如何，沒有人可以否認這個體系確為心理學和精神醫學帶來一申興盛的產業。

直到今天，潛意識的存在，埋藏的記憶，遺忘的經驗，看不見的內在因子，和生命早期性的意義，早已成為一般常識了。

這股風潮當然也吹入了文學。不管有沒有閱讀過佛洛伊德的著作，許多作家依然直接間接受到他的影響，Marcel Prousts的系列小說the Research of lost time揚益著佛氏的思想，我們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佛洛伊德便不可能有這本書。這樣的影響也可以在其他著作中發現，例如James Joyce，Virginia Woolf，Eugene O'Neil。

## 六、在美國，醫學小說已經成為一股風潮

在文學作品中，疾病可以自然而然地附屬於情節，也可以成為情節的主體。毛姆最偉大的小說，Of Human Bondage中主角之所以崎足絕非偶然，反而事關重大，因為這已解釋他的自卑和自卑的行為。在Thomas的魔山中，結核病是一切的動力。全書深入地探討困處深山療養院中的患者，在道德上，智力上奇特的病異。

小說和戲劇也常是傳達目的的利器。前面所提「貧婪」即是一例。此外Sir Rider Haggard的Dr. Thorne為預防接種請命；幾年前在紐約上演的Medicine Show鼓吹醫學社會化。這些作品固然有其不可磨滅的文學價值，卻也同時完成了重大的使命。

從羅馬時代的詩人到G.B. Shaw，醫學一直是輕微



或惡毒的調侃對象。有時針對病人，如莫里哀的 *Le Maledi Imaginaire*；大部份則指向醫生。Samuel Butler 的 *Erewhon* 描寫一個罪犯得醫治，病人受懲罰的烏托邦世界。對浪漫主義者以病痛為傲的陋習作健全的反擊。

時至今日，尤其在美國，醫學小說已經成爲一股風潮，人們似乎也有無窮的胃口來吸收他們。現代醫院和實驗室叫人們著迷，在醫院工作的男男女女的生活也充滿了與死神纏鬥的戲劇性。有些小說是醫生寫的，有些不是，有些寫的好，有些不脫俗套，來有可觀，有些只以醫院為背景，托一段感性的情史，另一些則正面探討醫學的問題。筆者服務的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裡總是收集了許多這一類的書，只是沒時間閱讀。我們有一個深深的感覺，就是有一天，這些書一定全成爲醫學史珍貴的資料。說到這兒，另一個問題又出來，就是小說可不可以成爲歷史的依據。

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只要我們嚴謹地查考，分明的運用。荷馬當然不是醫生，可是他的作品充滿了疾病與治療的記載，而這些不正反應出當時的醫學觀嗎？因此只要醫學不致成爲象牙塔內的專門知識，即使詩人所寫有關醫學的記載亦不可偏廢。從這個角度來看，每一個希臘的詩人便都是重要的資料來源了。

當我們閱讀諷刺性作品時，絕不可以忽略作者誇大的成分。莫里哀時代的醫生並不如書中所說的那麼壞，只是他的描寫並非虛構，輕微的調侃便無可指責。一門嶄新的科學在 17 世紀興起，學院內的學究卻仍然保守著中世紀落伍的性格，一般醫生也不明究裡，因此造成一種滑稽的狀況。莫里哀正是利用了這個弱點，加入其個人對醫學的怨懣，因而寫出許多諷刺醫學的作品。

回憶錄，日記，信或其他文件都能告訴我們許多事情。例如 Pepy 的日記和 Sevi gn'e 夫人的信便寫滿了疾病和疾病的治療。這些資料清楚的表達了病人對“醫學”的看法。

註一：左拉，法國作家及戲劇作家；Naturalistic school 的領導人，主張戲劇須是“人生的切片（slice of life）”，毫無虛飾，毫不造作的呈現在舞台上。他的戲劇作品 Therese Raguin 便是此一理論的具體實現，開啓了戲劇自然主義的先聲，對法國及全歐的戲劇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本文後半所提到的小說 *L'Assommoir* 是左拉最成功的作品，曾經搬上舞台並翻成英文的譯作。

註二：Naturalistic school，以實現“人生的切片”之戲劇型態為宗旨而創立的戲劇學校；始創於左拉，經典之作爲 *Therese Raguin*。在此劇的前言裡，左拉強調“將生活和 19 世紀以來增長不斷，邁向真理，科學的偉大運動相結合……”。

註三：浪漫主義（Romanticism）運動，18 世紀爲抗拒教條嚴峻，形式至上的古典主義而興起之人文自覺運動；範疇頗廣，遍及文學，音樂，美術和政治，其中以文學爲最，在英、法、德諸國榮根結果，蔚爲風氣，間接塑造了二十世紀今日社會的雛型。爲浪漫主義界定單純的定義並非易事，但浪漫性格（Romantic Character）則可以爲新的，自由的，個人的，感性的，實在的，自然的以及深層自覺的內省傾向。

註四：自然主義，十九世紀末葉爲反抗矯柔造作，生硬虛浮的戲劇表現而興起的改革運動；強調毫無妥協的呈現人生的真實面。左拉和史特林堡（Strindberg）是此一運動的先驅；左拉的作品 *Therese Raguin* 是第一部爲此而構作的自然主義戲劇（Naturalistic Drama）。